

# 甲申三百季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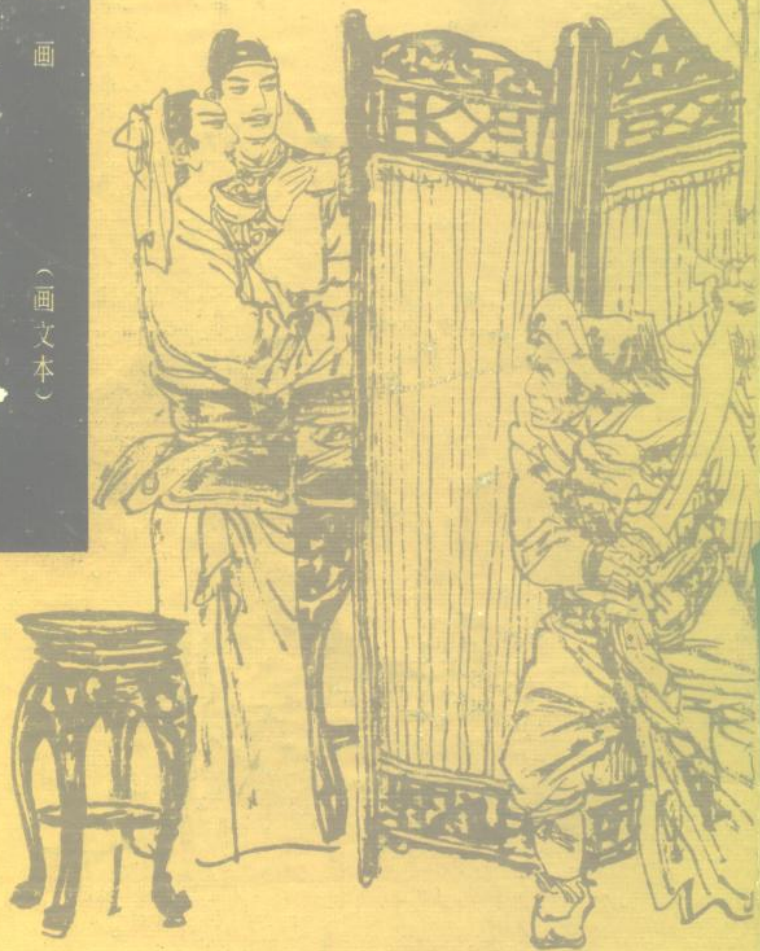
郭沫若

著

汪国新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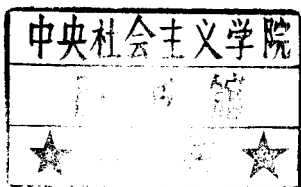
(画文本)



K248,301

86217

# 甲申三百季祭



汪国新 绘  
郭沫若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封面题字：王超尘  
装帧设计：叶海燕  
责任编辑：郑世俊  
叶建森

## 甲申三百年祭

---

郭沫若著 绘画：汪国新

责任编辑：郑世俊 叶建森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人民路6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787 × 1092毫米 1/32 印张：3.25

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

ISBN：7-5356-0544-3/J·489 定价：6.70元

湘新登字 367号

## 编者的话

2077/12

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主席曾告诫全党同志，不要做李自成，不要一进城就被一道官墙把自己和人民隔开了。他要求各级干部要经常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先生在这部著作中，将明朝灭亡的因果和李自成成功与失败的原由，剖析得十分透彻。

明朝的灭亡，实在是君是亡国之君，臣皆

亡国之臣。可以说统治者从上到下都已经腐败透顶了，所以灭亡是注定了的。

李自成的政权则是从廉洁清明到腐败堕落，从爱护人民到脱离人民，从重用人材到毁灭人才，所以他失败了。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廉政建设能否搞好，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经济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更应该重视这个问题，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出版插图本《甲申三百年祭》，是应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提供的新版本。让大家都来吸取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编者 一九九二年八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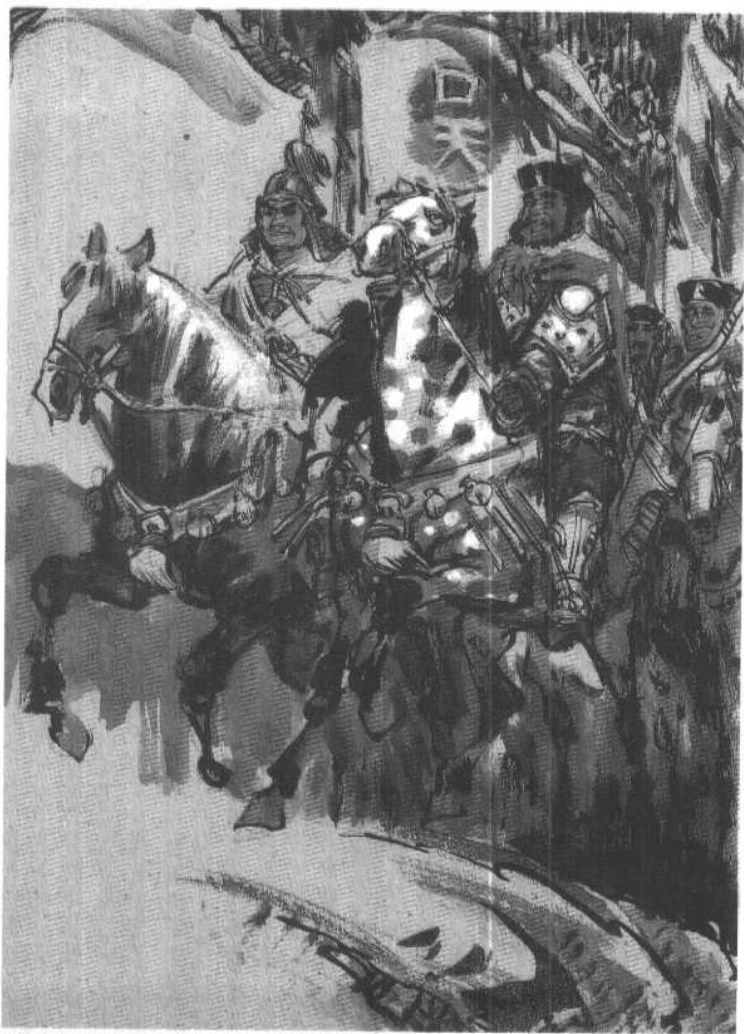
甲申轮到他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三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只是仅存形式的了。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运动，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兵的人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炆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禎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糙类糠皮，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以为食，冀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则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有翳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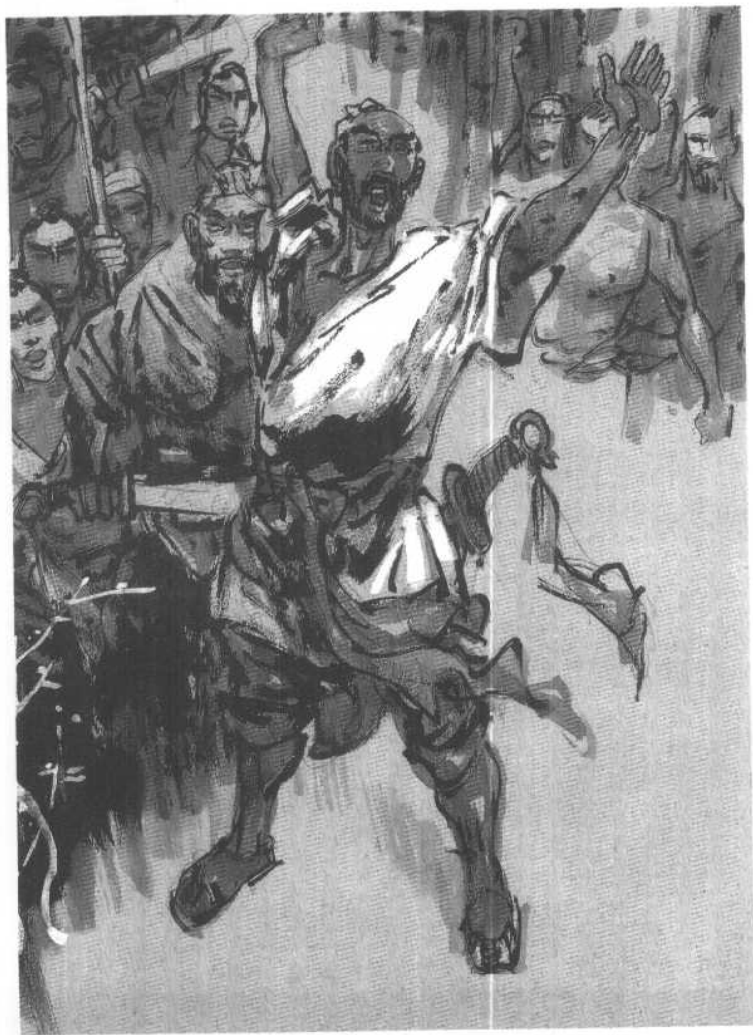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析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于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辈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者。假使政治是修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